张学良的家世

周大文

1901年旧历四月十七日，将军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詹家窝铺。将军名学良，字汉卿，别号毅庵（收藏书画多用别号），乳名小六子。将军远祖姓李，世居河北大城，后迁山东。清道光年间始徙辽宁省海城县。其曾祖过继于舅父张氏，始改姓张。将军祖父名有才，娶邵氏，生一女；继室王氏生三子，长名作泰，次名作孚，作霖行三，家极贫。张有才不务正业，性嗜赌博，家曾设赌局，好与人争吵，常打架。因与同村无赖王某结仇，一日夜间，张有才在地头纳凉，被人用镐打死。时值夏令，乡约[1]栾风泰恐尸体腐烂，用盐将尸体腌上，赶快到海城县报案。该地离海城90里，最快需两日。知县据报，随即率仵作衙役等来乡验尸。全身无伤，惟脑后被刃物打破致死。通缉凶手，王某闻风远扬，迄未捕获归案。乡里集资买一薄板棺材，厝埋在别家地头上。是年秋间雨大发水，将棺材冲走。后在叶家铺荒郊发现此薄板棺材，被一小土岗搁浅，棺材前还有几棵高粱挡住。以前柩埋的所在，并非自己之地，又兼无力搬运，且此处地也无主，顺便就埋在该处，至今仍未迁移。时长子张作泰不足20岁，有痨病不久死去，作霖年仅14岁。邻里怜其母子等孤苦，多方援助，张母靠双手为人做针线活，养着二子一女度日，生活极苦。时鞠家

① 在乡里中管事的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铺有秀才杨辅庆，字尚吉，业塾师，课蒙童数人。张常在窗外，把窗纸抠破窃听。一日被塾师看见，问他在此做什么，张答在此偷听读书。杨令其入学，他说无钱，不能给束脩。杨说我不要钱，可通知汝家白念好了，于是张入学。仅三个月即辍学，因家中要他拾柴，帮着母亲做饭做杂务。他的二哥作孚，给人做童工，以维持生活。张那年13岁了。后张当统领时，请杨辅庆老师教其子女等，杨即张学良开蒙之塾师。张15岁时，学木工，因过于顽皮和闹情绪，被师傅辞退。张16岁时，在赵家庙作小贩卖包子，在郭家小包子铺赊货，余货卖不出时即自食。因此，时常拖欠货款。一日下小雨，货未卖出多少，剩有半篮多包子，遇有几位乡里老太太赌马掌纸牌（与麻雀牌赌法相似），张要参加，大家不带他玩，怕他输钱不给。他说："我虽无钱，有包子，你们怕什么？"于是勉强加入。恰巧他一人大输，张急中生智，把老太太们的钱抢走不少，提篮向外就跑。大家站起来就追，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哪能跑过十几岁的男孩子呢？他见老太太们追不上，离他很远，转过头来向老太太们作鬼脸，嘻皮笑脸地说："你们下次别同我玩了！"老太太们气极，大骂了他一顿，只好回去。郭家小包子铺因他赊欠太多而倒闭。后来张当督军时，郭家小包子铺老头来沈阳，找张要帐，先与门岗卫兵争吵，后张到门口问这老头："你认识我吗？"老头说："我不认得你，我找张作霖要欠帐，听说他阔了。"以后张把这老头留在马号看门。

张做小贩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维持，遂改业在同里学兽医。他很留心学习，并喜良马，从此对于医马和相马的技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气干了两年多，总觉得这行业没有出息，乃辞去，在各处游荡，以赌博为生。一日因输钱不给，在他表舅赵发门前，被绑在树上遭人毒打。张仍破口大骂，毫不示弱。时村中有赵老恒，家道小康，见而奇之，拟将女妻之，惟女母及女舅皆反对，当时未成。

张此时无路可走，乃立志赴营口田庄台，投入毅军。惟军中无余额不能补正名，就当了一名伙夫。时值甲午，正前清与日本战争之时，在军中招募一名谍报员，深入日军后方，探听一切军情。张应

募前往，得到不少情报，累次建功，先予以功牌，后擢升哨长。该军营务处袁甲三见张伶俐，调张充任戈什。当时的军人都嗜赌博，长官们在上房赌，他就同米振标、于文孚（于学忠之父）等在下屋赌。军中马有病，张常去医治，但决不做专业。其二哥作孚因讼事在省城羁押，他请假去奉天营救，时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有爱马有病，经过若干兽医皆未治好，张得知，请试医治，不数日治好，依将军大喜，酬巨金，张不受，只求将其兄释放，将军允其请，作孚得释回家。

张入毅军充戈什是1895年，他21岁。想起赵家亲事，他深知内情，只要赵家女母和女舅不反对，这亲事就算成功。他大胆地请两个月婚假，带着功牌和哨长扎委和不少礼物去赵家。先未提起婚事，假说串门，对女母和女舅貌极恭顺，并出示所得功牌和哨长扎委等。过了不几日，女母和女舅竟改口说这少年将来必有出息。他见时机已到，乃托人向赵家求婚。赵老头当然乐意，女母和女舅也无异言。男女双方都21岁结婚就算晚了，所以办得很快。赵氏貌不美，且目有斜视病，但甚能干。张好骂人，常与同伙等发生龃龉，经赵氏从中斡旋，赖以相安无事。1896年赵氏生一子（不久即死），1898年又生一女，名首芳，后嫁与鲍贵卿之次子莫麟为妻。

一日张见村中塾师卢某之女甚美。张找女舅为其帮首程敬芳提亲，女舅不允，推说："程是外乡人，不知底蕴不嫁，若象你这样的人才能嫁。"张乃记在心中，不断向卢家献殷勤，甜言蜜语求婚。女舅原想张已有妻，故说了一句"象你这样的人才能嫁呢"，他认真来求婚，女舅说："你已有妻，我的甥女岂能给人做二房？"张答应两头为大，决不是二房。卢某本拟将女送往北镇县城内逃避，惟路经40余里，尚有其他，必为抢去无疑，比较起来，还是张好点，遂决意嫁张。1900年秋间张娶卢女，赵氏料理一切婚礼，时赵已怀孕学良三个月了①。

---

① 据张景惠在苏联时亲口所说，张学良是在他家出生的，产后约五六个月张作霖始将妻子接走。

1906年张在一年里连娶三位夫人：即三太太戴夫人、四太太许夫人、五太太寿夫人。张在拉帮时，劫夺财物甚多，并劫抢过帝俄一批金币，办团练时又打下其他小帮财物不少，因以富有。性喜良马，不惜出重金收买，当管带时个人有良马十余骑。后赠与奉天营务处总办张锡銮两匹。因张锡銮最爱马，故有"快马张"的绰号。张后来充督军时，因与溥仪之叔载涛有同好，成为好友，故张常诵"美人名马英雄胆"之句。张素重文人，常请教益。虽幼年读书三个月，能粗通文字，将孙子十三篇和尉缭子兵书常置于枕边。对军士们讲话至少两三小时，滔滔不断，言之成章，但不能执笔。三太太戴氏原为县内捕盗班头之儿媳，貌极美，经杜泮林设计说亲，用去万金，先在外边居住4月，后与四太太许氏同日进门。后来张初任督军时，因戴打使女被张看见，赶出府门，削发为尼，郁闷而死。经阎泽溥介绍，又娶前黑龙江寿将军外家王氏之女寿氏，由奉天接到新民。寿氏聪颖，能说会道，机警过人。寿氏初到洮南时，卫兵列队欢迎，寿亲为讲话，极得体，并有赏赐，因此，部下皆称赞之。

张的大太太赵氏生一女首芳，二子学良、学铭。生学铭时，看门人老薛午睡做梦，见一小喇嘛，直入院内，起追之，适与张统领相遇，张见薛问："跑来做什么？"薛说："见一小喇嘛进院，故追入。"张骂薛："胡说，你做梦吧！"此时赵氏适生学铭。张骂："这小子，找我算帐来了。"因张办团练时，在匪帮内有一小喇嘛被他枪杀，因此不甚喜学铭。1911年冬赵氏携学铭来奉找张要钱，赵与学铭住外间，张住里间，因学铭夜啼，把张吵醒，张起来把学铭打了一顿，赵与张争吵，次日即回新民杏核店胡同家中，转年4月间赵氏病死。在赵病时，张先派卢氏往看，自己也去看过，但未说话。赵死后，给张去电报，张先不信赵死。赵氏死时年38岁。时学良12岁，学铭5岁，由卢氏照管。卢氏生二女，1907年生一女名怀英，1911年生一女名怀卿。许氏生二子二女，1911年生学曾，1915年生学思，1909年生怀瞳，1913年生怀曦。寿氏生四子，学森、学俊、学英、学铨——生学铨正值郭松龄反奉之时，生在南满站日本顾问松井家中，乳名太

平。后来寿氏又为张在天津娶六太太马氏，生一女怀敏。

1915年，张学良娶辽源商人于氏女，名凤至，长将军3岁。生女闾英，生子闾珣、闾玕、闾琪；第三子夭亡。又娶赵氏女，生一子，名闾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张学良的老把叔张作相*

张　杰

流落异乡的泥瓦匠

张作相字辅忱，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锦州义县南杂木林子村（原籍是直隶省深州镇）。幼时家境贫寒，父亲张永安平日务农，遇到村里有婚丧嫁娶之事也给人当吹鼓手。母亲刘氏精明贤惠，尽管家里生活拮据，还是供张作相读了三年私塾。甲午战争爆发后，辽西也遭战乱，张家从此家计日窘，张作相只好给本家一个秀才叔叔张永清做帮工。这位族叔看他五官端正，气质淳厚，待他很好。族叔的儿子张作正与张作相脾气相投，两人也非常要好。

甲午战争后的辽西一带社会秩序极度混乱，而张作相的家乡，又历来有家族械斗的恶习，乡里有仇人冤家，多在私下报仇而不经官府。张作相16岁那年，族兄遭仇人暗杀，他自己也随时有遭暗害的可能，不得不离家出走，流落在锦州一带。庚子年又流落到奉天（今沈阳），常因衣衫褴褛遭到欺辱。他农忙时到村里给人打短工，农闲时就到城里给人做泥瓦活。后来有人说张作相是瓦匠出身，概

---

* 本文作者系张作相次子张廷枢之子。

缘于此。

投奔张作霖

张作相深感世道不平，逐渐产生了不惜铤而走险也要出人头地的想法。他走出的第一步是同本村的一个人策划打死了杀害他族兄的仇人，随后率十几人逃到双阳旬南山大庙内。翌年（1901年），张作相率二三十人到新民府八角台村投奔张作霖。张作霖见他与自己同姓，很高兴，就把他收了下来，视如亲兄弟。张作相与作霖、张景惠、汤玉麟，组成了200多人的"保险队"。此后张作相一直跟随张作霖，成为张作霖的忠实伙伴。

1902年，张作霖所部（二三百人），被清廷收编。张作霖被任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张作相为哨官。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在奉天设立负责整顿地方旧军的巡防营务处，将全省旧军编成八路巡防队，张作霖任前路统领，张作相为骑兵一营管带。1907年，张作霖已拥有步兵5个营、骑兵7个营的实力。此后他不断兼并收编地方武装，实力发展很快，到1908年已有精锐部队3500人。在此期间（1907年），张作霖与张作相等八人结拜为把兄弟，按年龄顺序是：马龙潭、吴俊升、孙烈臣、张景惠、冯德麟、汤玉麟、张作霖、张作相。这是奉系集团的最初成员。

独挡一面的封疆大吏

随着张作霖权势的发展，张作相也逐步升迁。辛亥革命后（1912年），赵尔巽任奉天总督，张作霖任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先后为二十七师骑兵团长、炮兵团长。1916年，张作霖被封为盛武将军，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相为二十七师步兵旅长。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作相任巡阅使署总参谋长，后改为巡阅使署总参议，兼任二十七师师长和卫队旅旅长。

1911 年赵尔巽恢复讲武堂时，张作相还是中下级军官，曾奉命受训。1919 年张作霖重建讲武堂（定名东三省讲武堂）时，张作相已兼任堂长。1922 年、1924 年先后爆发两次直奉战争，在这两次战争中他都出任了要职。第一次直奉战争他奉命统领东路军。失败后，张作霖急欲提高奉军战斗力，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作为整军经武最高执行机构，孙烈臣任统监，张作相任副监。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相担任后方总预备队、第五方面军的军团长，负责巩固后方。而他在奉系中任职最长的要算是吉林督军了。1924 年他奉命就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这个职务虽没有他原任的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实权大，但总算是独挡一面的封疆大吏。

张作相不是奉系的最高决策人，他追随张作霖，对张氏忠心耿耿，但在内外政策上却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固守关外，将养生息，训练士兵，扩充实力为上策”。基于这种思想，两次直奉战争他都持反对态度。也基于这种思想，他在吉林督军任上，做了一些有益于民众的事。譬如他曾抵制张作霖开放烟禁、“种毒筹金”的政策，在吉林严禁种鸦片，严禁吸毒贩毒；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独自兴建吉海铁路，并创办吉林大学等等。

在奉系中深孚众望

张作相与张作霖两次结拜（第二次是 1927 年在北京，张作霖提议与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孙传芳、张宗昌、韩麟春、褚玉璞等结拜为盟兄弟），对张氏忠心耿耿。但他在这位盟兄面前也敢于直言不讳地提出不同意见，所以深得张作霖的信任。张作霖在众多的把兄弟中与张作相关系最密切。他每发脾气或与人发生争执，张夫人便派人请张作相去调解。也只有张作相的劝说，他才听得进去。奉系其他首脑间或家庭中出现纠纷，也常是张作相出面斡旋。张作相为人忠厚，常在别人危难时给人以帮助，所以在奉系中素有“忠厚长者”之称。后来奉系内部出现老派和新派的矛盾，他本是老派

人物，因为在处理郭松龄事件善后等问题上，表现出待人宽厚的胸怀，所以也深得新派人物的好感。

1925年11月，奉军内部爆发了郭松龄反奉倒戈事件。郭松龄（字茂宸，奉天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有改革现状的思想基础，是奉系中新派的代表人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率领第三军（军长是张学良）入关，1925年11月在河北滦州宣布倒戈反奉，率精兵10万余众，占领山海关，并向奉天进发，在新民县巨流河一带与奉军决战，不幸失败被捕。郭松龄夫妇被就地枪决，其他主要将领也大多被俘。

张作相指挥第五方面军参加了巨流河决战。他痛恨郭松龄的叛变行为，但他认为兄弟间兵戎相见是不幸的，事态不宜扩大。当奉军攻占郭部总司令部时，他立即派人前去安抚被俘官兵。当晚他又亲临郭部，对那些被俘将领说：我们都是多年袍泽，在这次战乱中兵戎相见，是东北的不幸，死去的袍泽已无法挽救，活着的官兵由我负责保护大家的安全。我要向老将（张作霖）替你们请求宽恕，有我一息尚存，就不至再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

谁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12月29日晚，张作霖在奉天大帅府召集讨郭善后会议，奉军主要将领都出席了。会议一开始，张作霖就大骂郭松龄把他“害苦了”，又骂张学良“太信任郭鬼子”，接着脸色阴沉地说：“郭逆夫妇已经正法，其他胁从附逆分子甚多，是否也该彻底究办，以儆效尤？”

会场气氛十分紧张，吴俊升、张景惠、汤玉麟等老派人物，素日仇恨新派分子，欲乘这个机会杀一批以儆将来，因此他们表示这些东西都是郭鬼子一手训练出来的，将来恐怕还是靠不住的，不如乘这次逆变一网打尽。杨宇霆在这次平乱中有功，说话也有分量。他坚决主张“要根除首要分子”。在杀气腾腾的气氛中，张作相却站出来郑重地说：“郭松龄既已伏法，其他人员都是我们桑梓子弟，多年袍泽，应该让他们戴罪立功，一律免究，以安郭军部下之心。”大多数人反对他的意见，他却不肯让步。双方辩论了两个多小时，张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霖一直不表态。张作相看形势严重，竟在会场中哭了起来，说："如果非杀他们不可，那就先把我张作相杀了吧，我可不愿意再看见不幸的惨剧了！"会场里的紧张情况慢慢地缓和下来。这时张作霖才最后表态说："那就交给学良去看着办吧！"

这时张学良还在新民县听候命令，等待处理善后。张学良本来同情那些被俘将领，自然不会加害，郭松龄手下的将领一个也未受处罚。

张作相保护的这批人，后来在东北军进关后和西安事变时大多成为东北军的中、高级骨干。妥善处理郭松龄事件的善后，使张作相在新派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在以后的皇姑屯炸车事件后，在新派老派矛盾重重的动荡局势中，他是唯一能出来稳定局势的关键人物。

辅佐张学良掌握东北军政大权

1928年6月4日，发生皇姑屯炸车事件，张作霖、吴俊升一同殒命，奉系将领一时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急需确定新的首领。当时新派老派虽各有主张，但在许多人心目中，张作相是合适的人选，所以在张学良尚未回到沈阳的时候，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曾公推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并将公推书和印信送到张公馆。张作相坚决不接受，说等张学良回来后从长计议。

张作相一直把张学良视为少主，早在1920年张学良从东三省讲武堂毕业时，他就向张作霖建议让张学良接替他兼任的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职务。1921年他又携张学良去日本，参观日本陆军秋操，以期激发张学良立志图强之心。此时他唯一愿望是辅佐张学良继承父业。

张学良兼程赶回沈阳后，除着手办理丧事外，即召集东北元老开会，研究接代张作霖的问题。张学良以自己年轻，极力推崇张作相统辖东北军政大权，并派人送去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公推书和

印信。张作相坚决不受，一定要让张学良继承父业，而他愿尽辅佐的责任。张学良在张作相等人的坚决拥戴下，终于名正言顺地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

张学良与张作相关系一向密切，他早年称张作相为老叔，后改称辅帅，此时，又让原配夫人于凤至做了张作相的第二个夫人花福田的干女儿。当时花福田因为自己只比凤至大十几岁，不敢答应。张作相说："认就认吧，这也是学良的主意。"这样两家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张作相尽全力辅佐张学良尽快稳定东北局势。尽管他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历来不甚信任，但他对张学良的易帜主张还是大力支持的。他在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上，领衔联名向南京政府宣布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军内部并不完全统一，杨宇霆、常荫槐等人有觊觎张学良地位的嫌疑，日本帝国主义又不断向东北集团内部伸出黑手，制造派别纠纷，企图形成内乱，使易帜成果付之东流，这使张学良格外忧虑。1929年1月10日深夜，发生了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事件。就在这天夜里大约12点半左右，张学良派人请张作相来商量善后事宜。张作相说："办就办了吧，只是要好好办二人后事，以安杨、常左右。"张学良依计而行。

退出军政界

1930年9月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进关，张作相任东北四省留守司令驻在沈阳大帅府，主持东北后方的一切事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作相因父亲去世正在锦州西郊料理丧事。当时，张作相不相信日本能吞并东北，认为只要象皇姑屯事件时那样沉着应付，就可以依靠"国联"的力量抑制日本，迫使日本撤兵。他曾对前去吊丧的何柱国等人说："日本无论如何吞不下东北，东北总归是我们的，大家不必担心。"这几句话可以代表当时东北军大多数高

级将领的态度。谁知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九一八事变时，张作相的吉林省省主席职务由省参谋长熙洽代理。熙洽是清朝皇族（爱新觉罗氏）的宗室，1911 年张作相在奉天讲武堂受训时，熙洽是教官，张作相很尊重他。张作相任吉林督军后，任熙洽为参谋长，对他十分信任。而熙洽暗藏复清思想，加上他留学日本，与日军师团长多门二郎有师生关系，素有亲日思想，所以，九一八事变后，熙洽趁张作相不在，以代理长官名义出卖了吉林，由复辟狂变成了卖国贼。张作相对熙洽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慨，遂电令在吉林的军政人员不要听从熙洽的伪令，并委派诚允到宾县组织吉林省临时政府，与熙洽的汉奸组织相对抗，但已无可挽回，一年后吉林省全部为日军所占。可以说轻信和错用熙洽是张作相政治生涯中的最大失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严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侵华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全境，接着又向关内逼进。1933 年初日军进犯热河，威胁平津。迫于全国强大的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抽调部分军队加强长城一线的防卫，任命张学良为第一集团军军团长，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军团长，开赴承德及密云、古北口一带。但蒋介石仍旧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投降政策，加之各派系军队号令不一，长城抗战终于失败。蒋介石却把责任推到张学良身上，逼张学良下野。张学良回到北平后，立刻给张作相打电话，说明蒋逼他下野的情况，并说：“您老也马上来吧。”就这样张作相于 1933 年退出军政界。

隐居天津十二年

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当上傀儡皇帝。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原东北军的高级军政人员采取各种手段威胁利诱。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东北元老”到伪满洲国任要职，成了可耻的汉奸。

张作相在 1933 年退出军政界以后，一直在天津英租界隐居。

当时日伪当局和已成为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的张景惠，认为张作相是素孚众望的东北元老，很有号召力，于是对他交相逼迫。先是张景惠派其亲信洪维国（后来成为伪满洲国财政次长）到天津劝降。洪维国利用他与张作相同乡及旧属关系，软磨硬泡，甚至送来支票和伪满洲国的委任状；后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又亲自出马。板垣身穿长袍马褂潜入张作相公馆，诱迫张作相出来为日伪做事，结果都遭到张作相的断然拒绝。板垣走后，张作相曾愤愤地对家里人说："我是中国人，我还得给子孙留点德性哪！"

洪维国、板垣的劝降未能得逞，日本特务机关又使出另一种卑劣手段：在天津的日本租界里发出"号外"，声称张作相已离开天津到霸县其次子、一一二师师长张廷枢处，准备再出来指挥东北军。因为当时东北军已由国民党统一指挥且张学良正在国外，制造这种谣言的目的显然是挑拨张作相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果然，国民党当局闻讯后，马上派特务在张作相的住所周围盯梢监视。也就在这个时候，在张作相的卧室窗下发现了两颗炸弹。这炸弹是国民党特务放的，还是日本特务所干，就不得而知了，两方面都有可能。对国民党来说，张作相再回到东北军，对其控制指挥东北军不利；从日本方面说，这样做可以威逼张作相倒向日本，以达到其卑劣目的。

张作相在天津英租界时，家里人口很多，加上厨师、听差等不下百余口，开支很大。当时张作相的主要财产都在东北，他曾通过他的老友张景惠、旧属熙洽要求日伪当局发还他的财产，而日本关东军首脑则以张作相必须到满洲国任职为条件。张作相既拒绝当汉奸，财产也未得发还。日本军国主义对张作相不肯就范非常恼火，曾炸毁了张作相父亲的坟墓，占领天津后又查封了张作相的部分住宅。张作相自1933年随张学良下野退出军政界，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直闲居在家，养花种草聊以自娱。

为营救张学良而奔走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张作相看到当时形势很紧张，心中忧虑，关心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处境，常派人去询问东北军的情况。西安事变发生后，他闻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消息，大吃一惊，连说："太幼稚了！太大意了！"，他忧心忡忡，最怕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处理不当会影响张学良的生命安全。他盼望能够和平解决。当他听说陈诚率三个师开往太原时，万分焦急，马上派随他退出军界的旧属赵绍武去太原说服阎锡山协助达到和平解决的目的。当东北军内部主战和主和两派矛盾尖锐时，他又派赵绍武等人做东北军各级将领的工作，劝说大家切不可轻举妄动，要维持内部团结，以营救张学良为重。

西安事变后，张作相对张学良思念不已。囚禁中的张学良在与世隔绝的困难情况下，也没有忘记他的老把叔。1945年，东北元老、国民参政员莫德惠曾去贵州看望张学良将军，张学良一再打听辅帅情况，并为张作相在绢上写了一副条幅，称张作相为辅翁，大意是现在光复了，劝张作相不要忘了东北父老，还送给张作相几张他在这个时期的生活照片。后来莫德惠到北京看望张作相时，在张作相次子张廷枢家把张学良所赠的条幅与照片交给张作相（条幅和照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走）。

拒绝去台湾

抗战胜利后，张作相在原东北军的一些旧属的动员下，似有重新出来任职的意思。当时社会上也风传张作相有可能出来任东北行营主任。但蒋介石历来排斥异己，当然不会再让张作相这样在东北有威望的元老出来掌握军政大权，结果只给他挂个南京"国民政府顾问"的空头衔。

当然蒋介石对张作相表面上还是很客气的。1945年10月，蒋介石在北平宴请北方高级军政大员，张作相被邀参加。宴会上蒋介石把张作相让在主客座位上，恭维地说：抗战八年，你一个人在沦陷区，日本人多次引诱你，你没给日本人干事，这一点就十分可贵呀！

张作相心里明白，蒋介石不肯给他实权，却要利用他在东北军中的威望来安抚人心。他表面上虽虚与周旋，内心里却极不满意，一直没有去上任。1948年，蒋介石电邀张作相去南京开会，并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张作相气得在家里直骂："要是倒退20年，我就不听他这个令！"接着又骂张学良："小六子是败家子。"

1948年初，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土崩瓦解，蒋介石为了"维持东北人心"才委任张作相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实际上仍是徒有虚名。

这年9月，张作相因处理东北财产去锦州，正赶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10月15日，张作相在家中被误俘。当时的东北野战军主要负责人知道张作相是东北军主要知名人士，马上和他见面，希望他能站在人民解放事业一边，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张作相一再表示应诺，并推心置腹地诉说了东北军跟着蒋介石遭排斥的苦衷。当野战军负责人告诉他准备派人护送他回天津时，张作相感激地说：多蒙诸位厚谊。拿我个人来说，倒是愿意留在解放区，只因家在天津无人照料，我回去后还想把家安顿到锦州来。随后，解放军派人一路护送张作相回天津。当时天津还没有解放，在战争年代物质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解放军还特派了救护人员，一直把他护送到天津附近的芦台火车站。张作相非常过意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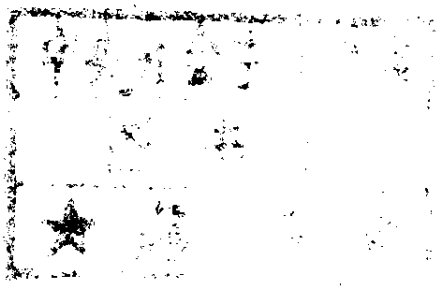
张作相回到天津后，蒋介石曾派人催请张作相去台湾，几次送来飞机票，并为家属准备了半条船的空位，张作相都毫不动心，告诉家属谁也不准走。

1949年3月，张作相患脑溢血突然去世。周总理得知张作相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遗憾，曾对张作相的外甥周鲸文说："老先生

怎么故去了？我们还要请老先生出来一起工作呢！”

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张作相的家属十分关怀。“文革”期间，张作相夫人花福田受到冲击，生活有困难。1974 年，她通过张学良的胞弟、全国政协委员张学铭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一情况，总理当即指示抄去的东西要退还，后来总理见到张学铭时又主动询问此事。

忆张学良将军



何柱国

我与张学良将军相处10多年，相从既久，相知较深，今天提到他，怀念之情，仍难以自已。听说汉卿还活着，我虽老而尚健，台湾回归祖国，为时不远，我想终有那么一天，他飞回祖国怀抱，把臂言欢，重话当年。

一、从纨绔公子到三军统帅

汉卿说不上是世家子弟，父帅张作霖出身绿林，结帮拉杆子起家，人称"马胡子"，因缘时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创立了奉张东北政权这一份家业。汉卿因系嫡出，人又聪明，深得乃父之宠爱，一心培养，期其有成，既令学文，又使习武，由于出身之特殊，环境之优越，放荡不羁，吃喝玩乐，生活上之挥霍放纵，众所周知，成为当时国内外知名四公子之一。所谓四公子是：张季直之子张孝若，段祺瑞之子段鸿烈，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四公子之中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有一定之影响者，则为张学良。

我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当队长，1922年由保定转到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我们同来的有20多人，接待我们的就是汉卿与郭松龄。他说："欢迎你们，你们都是军事人才，我们正需要！"他与杨宇霆、郭松龄将我们分别作了妥善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